

论五帝时代

韩 建 业

摘 要：“五帝时代”指古史传说中夏代以前的中国上古时代。通过对“禹征三苗”“稷放丹朱”“涿鹿之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考古学实证，基本可推知五帝时代具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从 4700 多年前延续至约 4100 年前，前后经历三个时期，大体自轩辕黄帝、蚩尤和末代炎帝等始，历颛顼时期，最后是帝喾、尧、舜、稷、丹朱、禹等。考古发现显示，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已迈过起源和形成之时而进入初步发展阶段，大概已有统治范围可能涵盖黄河流域大部的跨区域王权国家的萌芽。此后以“禹征三苗”为契机，长江流域也被纳入国家版图，夏王朝初步“一统”的格局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

关键词：五帝时代 传说时代 新石器时代

作者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五帝时代”指古史传说中夏代以前的中国上古时代，其历史真实性在古代原不成问题。但自晚清民国以来，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下疑古之风盛行，五帝时代因之基本被否定，极端者甚至有“东周以上无史说”。虽然因晚商都邑殷墟、早商都邑郑州商城等考古学发现，此说宣告破产，但对商代以前的夏代乃至五帝时代，学术界的质疑声至今仍未断绝。五帝时代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只有紧密结合文献史学和现代考古学，并以适当的方法展开研究，才有希望逼近答案。

一、文献记载中的五帝时代

《周礼·春官·宗伯》：“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其中“三皇五帝”显然指人而非神，且“五帝”晚于“三皇”。《周礼》所载官制等基本符合西周或者春秋时期的实际情况，^①可知“三皇五帝”的提法也当出自西周或春秋，而非战国以后的

^① 中国古人多相信《周礼》所载为周代礼制，有的说是“周公致太平”之书。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有了《周礼》成书于战国、西汉等说法。80 年代以后刘起舒提出《周礼》所载官制材料近于春秋，而没有受战国官制的影响。（参见刘起舒：《〈洪范〉成书时代考》，《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 3 期）张亚初和刘雨发现《周礼》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职官可在西周金文中找到依据，提出《周礼》的成书参考了西周职官实况。（参见

发明. 战国时期出现“五帝”的情况增多,《荀子》《战国策》中各 3 处,且多与三王、五伯并举,《吕氏春秋》中有 14 处之多,一般连称“三皇五帝”或“五帝三王”.和“三皇”有多种组合的情况不同,严格来说“五帝”说其实只有一种,就是出自《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当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①在《国语》中也有同样的排列顺序,^②很可能是至迟在春秋时期已有的说法,后被《史记·五帝本纪》采用.^③其他一些曾被称为“五帝”者^④其实并非确指,或者属于神圣而非人王.^⑤即便真正的“五帝”就一种说法,那也应该是从众多古人中挑选的结果,同时期还存在很多其他杰出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使用“五帝时代”这个概念,指称以“五帝”为代表的那个时代.^⑥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述,目前只能在商周及以后的文献中见到,被认为部分可能是“口耳相传”的结果,五帝时代一般也就被划到“传说时代”^⑦的范畴,相当于西方学术界所谓“原史”时期.

疑古学者多视“五帝”为神话人物,基本否定五帝时代的历史真实性.顾颉刚在 1926 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中明确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认为东周初年《诗经》里有天神禹,东周末年《论语》里出现尧、舜,战国至西汉伪造了许多尧、舜之前的古

张亚初、刘雨撰:《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沈长云和李晶则发现《周礼》职官数(冬官除外)的三分之一以上可在春秋文献或金文中找到根据,认为《周礼》职官系统更接近春秋.(参见沈长云、李晶:《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历史研究》2004 年第 6 期)

- ① 参见王聘珍撰:《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17—130 页.
- ② 《国语·鲁语上》:“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
- ③ 司马迁说:“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史记》卷 1《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46 页)
- ④ 刘起鈇共归纳出 7 种“五帝”说.参见刘起鈇:《古史续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92—119 页.
- ⑤ 《战国策·赵策》:“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在“三王”前列举宓戏、神农、黄帝、尧、舜,有以此五人作为“五帝”的可能性,但并未指明,何况宓戏、神农还常被列在“三皇”当中.《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将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作为孟春、孟夏、季夏、孟秋、孟冬五时帝,给他们分别配五时神,这里的五时帝已是神圣,汉代以后的五方帝更是神的性质了.
- ⑥ 王树民将五帝时代分为前期(黄帝、炎帝、蚩尤)、中期(烈山、共工、太昊、少昊、颛顼)、后期(帝喾、虞幕、祝融、栛机)和过渡时期(尧、舜、禹、皋陶、益、四岳).(参见王树民:《五帝时期的历史探秘》,《河北学刊》2003 年第 1 期)
- ⑦ 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皇帝”，^①结论是“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自三皇以至夏商……都是伪书的结晶”。^②更早的时候，胡适也主张“中国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以信的”。^③但 1928 年开始的对殷墟的发掘，发现甲骨文、宫殿、王陵等大量证据，确凿无误地证实晚商属于信史。这不但推翻了“东周以上无史说”，而且证明“层累地造成古史说”逻辑难以自治。^④又因晚商史业已被证为信史，早商、夏代甚至五帝时代的历史真实性也理应重新加以考虑。

其实早在 1917 年王国维就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论定《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殷世系几乎完全合于甲骨卜辞所见商人世系。^⑤王氏明确认为尧、舜、禹属于历史人物，不应疑古太过。^⑥之后蒙文通于 1927 年出版《古史甄微》，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以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⑦徐旭生在 1943 年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部族可以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⑧1935 年傅斯年则提出“夷夏东西说”。^⑨这些研究虽与传统的中华一脉古史观有别，但却都是在承认五帝时代真实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做出的综合研究。

五帝时代的诸多人物并非出于战国西汉以后的杜撰，这在晚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出土文献中也有所证明。殷墟甲骨文中的“四方”“四方风”，见于《山海经》和《尚书·尧典》。^⑩殷墟甲骨文中商人将帝喾（高辛氏）作为高祖，这也和传世文献吻合。^⑪刻有“天鼋”或“天”族徽的先周和周代青铜器主要分布在陕西，或与轩辕黄帝的

①② 参见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 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59—61、35 页。

③ 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东方杂志》第 18 卷第 16 期，1921 年。

④ 在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两年后，张荫麟就指出其研究方法的缺陷：“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 2 册，第 271—272 页）

⑤ 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第 9 卷，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409—436 页。

⑥ 王国维指出：“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反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2 页）

⑦ 参见蒙文通：《古史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9 年。

⑧ 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 197—204 页。

⑨ 参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1935 年。

⑩ 参见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1956 年第 1 期。

⑪ 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第 9 卷，第 409—436 页。

名号有关。①西周夔公盨记载禹敷土浚川，②春秋秦公簋记载“鼎宅禹迹”，③春秋晚期的秦公一号大墓石磬上秦人将高阳（颛顼）作为高祖。④战国时期金文简牍上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就更多了。比如齐侯因簠敦铭文记载田齐的高祖为“黄帝”，⑤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关于炎帝、祝融、帝俊、共工等的记载，⑥清华简《五纪》关于黄帝、蚩尤等的记载，⑦以及其他简牍上有关于尧、舜的记载。⑧

但需要承认的是，不管传世还是出土，目前尚不见晚商以前的相关文献。换句话说，所有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都见于至少七八百年之后的文献中，它们的说服力因此大打折扣。但学人很早就提出新的解决途径：“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⑨即便顾颉刚也认为，地下出土的古物既可以用来破坏旧古史，也可以用来建设新古史。⑩李学勤则从文献和考古结合的角度，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⑪显而易见，探索古史真相不能仅依靠文献记载，还得和考古学结合。

二、五帝时代考古学探索的方法

利用考古学探索并一定程度上实证古史，最重要的是达成传说和考古资料这两个古史系统之间的互证互释。考古资料是传说史料最可靠的参照系，⑫经过百余年的工作，这个参照系已经以中国史前（原史）考古学文化谱系为主要内容基本建立起来。假设五帝时代为真，那么当时不同族群集团的遗存及其时空框架也应包含在其中，只待与传说史料相印证。

-
- ① 参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38—341页。
- ② 参见李学勤：《论夔公盨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 ③ 参见雍际春：《秦公簋及“十又二公”考》，《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6期；孙庆伟：《鼎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
- ④ 参见王辉、焦南锋、马振智：《秦公大墓石磬残铭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2分，1996年。
- ⑤ 参见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年；丁山：《由陈侯因簠敦铭黄帝论五帝》一文“附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年。
- ⑥ 参见李零：《子弹库帛书》（上、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 ⑦ 参见程浩：《清华简《五纪》中的黄帝故事》，《文物》2021年第9期。
- ⑧ 参见王晖：《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新证》，《考古学报》2007年第1期。
- ⑨ 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1册，第268—269页。
- ⑩ 参见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1册，第270—274页。
- ⑪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9页。
- ⑫ 参见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序言”，第17页。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徐中舒就提出虞夏对应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太昊少昊对应黑陶文化(龙山文化)。^①到了 50 年代,范文澜又推测仰韶文化可能为黄帝时代文化。^②七八十年代以来,关于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探索更多。既有对炎黄^③、三苗^④、东夷^⑤、有虞氏^⑥、陶唐氏^⑦、共工氏^⑧等族群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的探索,有对“大禹治水”等个案的研究,^⑨也有从宏观上对五帝时代的把握,并主要形成两类意见。第一类意见认为,五帝时代大体可以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对应。如严文明、苏秉琦等认为仰韶文化后期(铜石并用时代前期)对应炎黄时期,龙山时代(铜石并用时代后

- ① 参见丁山:《由陈侯因簠铭黄帝论五帝》一文“附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3 本第 4 分,1933 年。
- ② 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9—10 页。
- ③ 严文明认为仰韶文化后期可能是炎黄文化。(参见严文明:《炎黄传说与炎黄文化》,王俊义、黄爱平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45—60 页)黄怀信提出仰韶文化为原始华夏族文化,其中半坡类型为炎帝部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部文化。(参见黄怀信:《仰韶文化与原始华夏族——炎、黄部族》,《考古与文物》1997 年第 4 期)沈长云则提出龙山时代的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参见沈长云:《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光明日报》2013 年 3 月 25 日,第 15 版)
- ④ 俞伟超认为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阶段文化为三苗文化(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而作》,《文物》1980 年第 10 期)石兴邦和周星提出中原龙山文化的南进和长江中游文化的退缩,可能与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有关。(参见石兴邦、周星:《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史的考察》,《史前研究》1988 年)杨新改和韩建业论证了王湾三期文化南下代替石家河文化的过程和“禹征三苗”的对应关系。(参见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 年第 2 期)
- ⑤ 严文明提出山东地区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属于东夷文化。(参见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 年第 9 期)
- ⑥ 李伯谦认为豫东鲁西南等地的造律台文化为有虞氏文化。(参见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 年第 4 期)秦文生进一步认为平粮台古城即为舜都。(参见秦文生:《舜都于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考》,《中原文物》1991 年第 4 期)
- ⑦ 李民、邹衡等认为晋南的陶寺文化为陶唐氏文化。(参见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1985 年第 4 期;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条件问题》,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 1 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162—179 页)
- ⑧ 邹衡提出河北龙山文化的不同类型可能与伯益和共工氏有关。(参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 253—294 页)
- ⑨ 参见王清:《大禹治水的地理背景》,《中原文物》1999 年第 1 期;夏正楷、杨晓燕:《我国北方 4 ka B.P. 前后异常洪水事件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2003 年第 6 期;吴文祥、葛全胜:《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第四纪研究》2005 年第 6 期。

期)对应尧舜禹时期,①笔者等进一步提出仰韶文化前期已进入炎黄时期;许顺湛认为仰韶文化对应炎黄文化,仰韶文化末期到龙山时代早期为颛顼时代,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对应帝喾时代,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对应尧舜时代。②第二类意见认为,五帝时代和龙山时代大体对应。如童恩正认为中原龙山文化和“五帝”符合,③沈长云、江林昌认为五帝时代大致对应龙山文化时期,④李先登等具体提出五帝时代早期的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相当于龙山时代早期,五帝时代晚期的尧舜禹时期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⑤徐义华认为龙山时代城址的大量出现可能与黄帝时代的战争背景相关。⑥

总体来看,上述关于五帝时代的宏观认识,时间上不出仰韶文化时期和龙山时代,空间上集中在黄河中下游,涉及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空间范围的框定基本就是根据文献传说,时间范围则是从夏商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前溯,大致符合“从已知推未知”的逻辑思路。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的发掘,确证殷墟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分别为晚商文化和早商文化,⑦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基本确定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⑧或晚期夏文化⑨,则五帝时代只能在之前的龙山时代甚至更前,但到底“前”到何时则不好确定。有些学者在基本信任文献传说的前提下,以神农氏“教民稼穡”为依据,⑩设想当时应为农业社会,认为应该从仰韶文化开始,但实际上中国农业在距今 8000

-
- ① 参见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序言”,第17—19页;郭大顺:《追寻五帝》,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21—140页。
- ② 许顺湛:《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州学刊》1992年第1期;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9—224页。
- ③ 参见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 ④ 参见沈长云:《五帝时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及人类学解读》,《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5期;江林昌:《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起源——建构中国特色文史学科理论体系浅议之三》,《济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 ⑤ 参见李先登、杨英:《论五帝时代》,《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6期。
- ⑥ 参见徐义华:《三皇五帝时代的再思考》,《南方文物》2007年第4期。
- ⑦⑧ 参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183—218、95—182页。
- ⑨ 参见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中原文物》1978年第2期;赵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17页;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
- ⑩ 如《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逸周书·考德》逸文:“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破木为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蔬之实。”(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39页)

多年的前仰韶时期已有初步发展。^①不少学者以《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轩辕黄帝征战四方、统一天下、置官监国为根据,设想其社会应该比较复杂高级,但到底高级到何种程度,是初步开始社会复杂化,还是即将进入或已经进入国家社会?这些其实都难以遽断。考古学上对农业起源发展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认识本身就存在不同意见。还有就是这种“比附”式宏观观察方式,很依赖于文献记载细节的真实性——而这本身是需要验证的。也有不少人想当然地以为,既然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比较模糊,那么与考古学的对应也自当比较宏观笼统才对,但问题是如果每一个细节和局部都得不到证实,又如何能保证整体和宏观的真实性?因此,对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探索,最终还需从细节和局部入手,而且必须遵循严格的论证逻辑,找到有效的研究方法。

“由已知推未知”的思路建立在考古学文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应于族群、国族的前提之上。我们可以将族群分成三种情况:一是具有相同文化传统、文化习俗和语言的事实上的族群,一般和考古学文化有较好的对应关系;二是当时人所认同甚至包含一定程度建构成分在内的族群,最容易在民族志中找到案例;三是文献记载中的族群。这三种族群多数情况下其主体部分应该是重合的,是以第一种情况作为基础的。国族指国家层面的族群共同体,由一个族群扩展或多个族群融合而成,因国家力量整合形成血缘、文化、语言、历史等方面的共性。因为文化等共性的存在,国族也会和考古学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但情况更为复杂。族群和国族的复杂性,提醒我们考古学文化和族群不宜做简单对应,^②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五帝时代尤其如此。但从商周二代国家范围和考古学文化圈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来看,^③考古学文化和国族的对证研究并非不可行,与一般族群的对证研究理应更有可能。

尽管如此,古史传说中关于特定族群的记载往往存在模糊或歧异之处,加之很难对族群和国族进行区分,而考古学文化本身通常也并非毫无异议,这就使得考古学和古史的对证很容易导向诸多难以验证的推论,对五帝时代的考古学对证尤其如此。这也是很多人质疑古史和考古学能否对证研究的主要原因。但如果我

① 参见赵志军:《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中国农史》2020年第3期;赵志军:《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续)》,《中国农史》2020年第4期。

② 李伯谦说:“特定的考古学文化往往是和特定的族相对应的,但考古学文化和族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考古学文化并不等同于族,不能和族直接画等号。”(李伯谦:《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七),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54页)

③ 甲骨文和传世文献记载中晚商王朝的王畿、四土、边疆方国,与殷墟文化中心区、亚文化区和文化影响区范围基本对应。(参见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金文和传世文献中西周王畿、封建诸侯国、边疆地区,与西周文化中心区、诸侯文化区、文化影响区范围基本对应。

们遵照严谨的逻辑,找到若干比较确定的关键点,再将这些关键点串联成面,而且和古基因、古语言谱系研究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增强古史对证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为此,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两种研究方法,即变迁法和谱系法。

“变迁法”就是以考古学上观察到的巨大变迁来一定程度上证实文献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的方法。考古学上的巨大变迁,包括考古学文化巨变和中心聚落巨变两个方面,前者指考古学文化面貌格局发生大范围的剧烈变化,后者指中心聚落、古城等突然毁弃或者出现破坏、暴力现象,两者通常互有关联。而这些在考古学上都是相对容易识别到的。巨变往往是大规模战争和迁徙事件的产物,推测也应当是古人最倾向于记载、传承下来的内容。因此,用考古学上的巨大变迁对古史加以验证,相对容易且确定性也较高。而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关键认识,又可以进一步作为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点。

“谱系法”则是将文化谱系、基因谱系、语言谱系和族属谱系相互结合的方法。族群既然和血缘、语言、文化都密切相关,那么如将它们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推论的确定性一定会增加。如果再将四个谱系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更加确定的推论。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已经确立,只是需要不断完善。对古代人群基因和语言谱系的建立方兴未艾,目前已经在揭示东亚现代人基因组、中国南北方史前人群迁徙与融合过程,以及汉藏、南岛和阿尔泰语系等人群的基因和语言谱系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族属谱系则需要对涉及五帝时代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进行整理分析,最终构建出上古时期族群谱系的基本框架,允许有几套可能性框架,最终以文化、基因和语言谱系来验证。当然,这里的关键是对“四谱”的互释,最佳的办法依然是结合重大历史变迁,由点及面逐渐展开。

三、考古学视野下的五帝时代

五帝时代有文献记载的重要战争事件,首先要数五帝时代之末的“禹征三苗”;与其大略同时的“稷放丹朱”事件,可能也有军事暴力发生;还有一个就是五帝时代之初轩辕黄帝和蚩尤之间爆发的“涿鹿之战”。考古资料显示,这些战争事件可能都真实发生过。

(一)禹征三苗与黄河流域文化的南下

“禹征三苗”事件在《墨子·非攻下》有详细记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五谷变化,民乃大振……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既已克

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①古本《竹书纪年》对三苗灭亡前夕的天灾有类似记载：“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②可见，“禹征三苗”应是趁后者发生天灾内乱之际发动的一场有计划的征服战争。

从文献记载来看，禹或夏禹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但具体地点不好遽定。史载“禹兴于西羌”^③、“禹会诸侯于涂山”^④、“禹都阳城”或“平阳”^⑤。禹的兴起或诞生地被认为在中国西部，^⑥禹会诸侯的“涂山”有被认为是在江淮地区，^⑦禹所都的阳城或平阳有晋南^⑧、豫西^⑨、豫东^⑩等不同说法。“大禹治水”“禹画九州”传说中禹的活动范围更广。禹是夏人首领，夏人主要的活动区域多被认为在晋南和豫中西地区，^⑪但也有其他观点。比较而言，三苗的居地更好确定。三苗属于徐旭生所说苗蛮集团，其活动地区虽然涉及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但到和尧舜禹发生冲突的时候，基本就是在江汉两湖地区。《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据考证，这个范围大抵东至鄱阳湖、西以洞庭湖为界、向北及于桐柏山。^⑫

- ① 孙诒让：《墨子间诂》卷 5，《诸子集成》第 4 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年，第 92 页。江林昌认为，《墨子·非攻下》等篇极可能就是墨子自著。（参见江林昌：《尧舜禹伐三苗的综合研究与夏代始年的讨论》，饶宗颐主编：《华学》第 5 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73—90 页）
- ②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65 页。
- ③ 《史记》卷 15《六国年表》序，第 686 页。
- ④ 《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 ⑤ 古本《竹书纪年》：“禹都阳城。”（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 1 页）张守节《史记正义》引《世本》：“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卷 28《封禅书》，第 1371 页）《孟子·万章上》：“禹避舜之子于阳城。”
- ⑥ 参见徐中舒：《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四川大学学报》1958 年第 1 期。
- ⑦ 参见李修松：《涂山汇考》，《中国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王吉怀：《“大禹治水”之“禹会诸侯”考》，《蚌埠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 期。
- ⑧ 参见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 本第 1 分，1935 年；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 年第 3 期。
- ⑨ 参见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中原文物》1978 年第 2 期。
- ⑩ 参见沈长云：《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 ⑪ 参见徐旭生：《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 年第 11 期。
- ⑫ 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 57—59 页。

夏禹作为夏王朝的创建者,其主要活动年代当在距今 4000 年左右。^①距今约 4100 年之前,在豫西南、豫东南和江汉两湖地区分布着范围广大的石家河文化,但之后发生文化巨变:石家河文化特色鲜明的陶器群大范围快速消失,新出矮领瓮、细高柄豆、侧装足鼎等与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接近的陶器,^②出现鬻、盃等龙山文化或造律台文化因素,致使豫东南、豫西南、鄂西、鄂北等地都突变为王湾三期文化,^③江汉平原及附近地区突变为和王湾三期文化接近的肖家屋脊文化;^④聚落遗址急剧减少,如大洪山南麓由石家河文化时期的 63 处遗址锐减到 14 处;^⑤从屈家岭文化延续至石家河文化的大约 20 个古城,此时基本都遭到毁弃,包括石家河文化的中心天门石家河古城;最保守的祭祀方式也发生突变,石家河文化大量用首尾相套的陶缸祭祀的现象消失,数以十万计的红陶小动物、小人、红陶杯等祭品祭器也基本消失或者数量剧减;在肖家屋脊文化当中出现前所未有的浅浮雕、透雕的小件玉器,此类玉器在更早的龙山前期晚段就出现在山东临朐西朱封、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禹州瓦店等遗址。如此大规模的黄河流域文化南下引起的文化和聚落巨变,只能是大规模战争的结果,和“禹征三苗”事件吻合。^⑥此前曾有人将“禹征三苗”解释为二里头文化向江汉地区的渗透,^⑦但此说在年代上似有抵牾之处,因为二里头文化已经是晚期夏文化了,和夏禹不能对应。

(二) 稷放丹朱与北方文化的南下

古本《竹书纪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⑧后稷指周人的始祖

-
- ① 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暂定的夏代始年为公元前 2070 年。(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年;江林昌:《尧舜禹伐三苗的综合研究与夏代始年的讨论》,饶宗颐主编:《华学》第 5 辑,第 73—90 页)
- ② 参见白云:《关于“石家河文化”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1993 年第 4 期。
- ③ 虽然鄂西北地区距今 4200 年左右已出现源自晋南的陶鬻,但文化面貌整体上仍属石家河文化范畴,至距今 4100 年以后才发生根本性变化。
- ④ 参见何弩、冯九生:《试论肖家屋脊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98—145 页。
- ⑤ 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江汉考古》2009 年第 1 期。
- ⑥ 参见严文明:《耕耘记——流水年华》,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 年,第 109—111 页。
- ⑦ 参见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而作》,《文物》1980 年 10 期;罗琨:《二里头文化南渐与伐三苗史迹索隐》,郑杰祥编:《夏文化研究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97—204 页。
- ⑧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 65 页。另《史记》卷 1《五帝本纪》正义引“后稷放帝子丹朱”。(第 20 页)

弃,①记载中他是帝誉的嫡长子,②理应最有资格成为帝誉的继承人,但他勤于农事而被封为后稷,就是当时的农官,实际继承人是和他同代的尧,这或许为后来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关于后稷的诞生地“有邰”,汉代以来流行泾渭说,③近世有晋南说.④尧子丹朱的居地被认为是在豫西南丹水,⑤其实当为被流放后的结果,之前应与尧居于一地.尧的居地又有山东、河北、山西诸说,山西说本身又有“平阳”说和“晋阳”说的分歧,⑥还有晋阳徙平阳说.⑦虽然后稷和丹朱—尧的居地有多种说法,但他们发生交集的地方却只有晋南.文献记载尧时已在丹水流域征服苗蛮,⑧丹水附近的陶甗极似晋南者,⑨晋南的丹砂也可能来自丹水地区,⑩后稷逐放丹朱于丹水比较符合情理.

按《尚书·尧典》所载,稷和禹所处时代大致相同,则“稷放丹朱”发生时间应与“禹征三苗”接近,在距今 4100 年前后.从考古学上来看,当时晋南地区确实发生了一次文化和聚落巨变:大量双釜陶甗出现在原本有甗无甗的临汾盆地,致使本地陶寺文

-
- ① 《诗经·大雅·生民之什》:“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即有邰家室.”《国语·鲁语上》:“周人禘誉而郊稷.”
 - ② 《史记》卷 4《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誉元妃.”(第 111 页)
 - ③ 参见齐思和:《西周地理考》,《燕京学报》1946 年第 30 期.
 - ④ 参见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1931 年第 10 期;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 297—356 页.
 - ⑤ 《史记》卷 1《五帝本纪》正义引范汪《荆州记》云:“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引《括地志》云:“丹水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第 20 页)
 - ⑥ 参见徐旭生:《尧、舜、禹(上)》,《文史》第 39 辑,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1—26 页.
 - ⑦ 《帝王世纪》:“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皇甫谧撰,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北京:中华书局,1964 年,第 37 页)
 - ⑧ 《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 ⑨ 陶甗是距今 4700 年左右发源于晋南的一种炊器,之后向周围传播扩展,至距今 4200 年左右已南抵鄂西北地区,见于十堰青龙泉等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存当中.(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青龙泉与大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35 页,图 113,9—11)青龙泉的陶甗大口且三袋足在器腹边缘,与之最为相近的是陶寺遗址所出陶寺文化的陶甗,而陶寺遗址又被认为曾经是尧都所在地,可推知鄂西北或丹水附近的陶甗,很有可能就与尧征服苗蛮有关.
 - ⑩ 参见方辉:《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兼论帝尧与丹朱传说》,《文史哲》2015 年第 2 期.

化剧变为陶寺晚期文化；陶寺遗址甚至附近的临汾下靳、芮城清凉寺等地大中型墓葬，^①几乎都被挖毁；^②陶寺遗址还有宫殿废弃、暴力屠杀、摧残女性等现象。^③双鬲高是老虎山文化的典型陶器，其分布范围主要在今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和冀西北一带。在陕西神木石峁、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都发现了距今 4000 年多年前的充满军事气氛的大型石城聚落，尤以 400 万平方米的石峁石城最为瞩目，^④显示其具有强大实力。考古学上的晋南巨变应当同老虎山文化南下密切相关，和“稷放丹朱”事件能够吻合。^⑤

“稷放丹朱”的考古学实证，证明陶寺古城在该事件发生前至少有一段时间应当是陶唐氏尧的都邑，而老虎山文化人群中至少有一支参与了后稷对丹朱的战争放逐事件。据记载，后稷是轩辕黄帝的直系姬姓后裔，北狄也是，^⑥而石峁古城很可能为北狄故城，则以后稷名义发起的这起事变，有石峁人群参与也是有可能的。^⑦至于《竹书纪年》等有关舜囚尧和阻丹朱的记载，^⑧似乎和儒家历来所称道的尧舜禅让之说相去甚远，其实有相通之处，即尧、舜更迭必然是因某一重大变故而发生，这一变故很可能就是“稷放丹朱”事件，“稷放丹朱”或许还有舜的参与。

-
-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编著：《襄汾陶寺——1978—1985 年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年；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临汾下靳村陶寺文化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 年第 4 期；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 12 期；薛新明主编：《清凉寺史前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年。
- ② 参见高江涛：《试析陶寺遗址的“毁墓”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45—354 页。
-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 2002 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 年第 3 期。
- ④ 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发现石峁古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石峁遗址管理处：《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皇城台地点》，《考古》，2017 年第 7 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石峁遗址皇城台地点 2016—2019 年度考古新发现》，《考古与文物》，2020 年第 4 期。
- ⑤ 参见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
- ⑥ 《山海经·大荒西经》：“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395 页）《世本》：“鲜虞，姬姓，白狄也。”（宋衷注，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13 页）
- ⑦ 参见何努：《对于陶寺文化晚期聚落形态与社会变化的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58—171 页。
- ⑧ 《史记》卷 1《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第 31 页）

(三) 涿鹿之战与黄土高原文化的东进

《逸周书·尝麦》记载：“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或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①似乎蚩尤和炎帝（此记载中误作赤帝）、蚩尤和黄帝之间的战争都发生在涿鹿，蚩尤曾一度侵袭炎帝，黄帝应炎帝所请而击杀蚩尤。但在《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和蚩尤之间的才是涿鹿之战，另有炎黄之间的阪泉之战，没有提到蚩尤和炎帝之间战争的具体情况：“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②《战国策》《庄子》等都有黄帝、蚩尤战于涿鹿的记载。^③至于炎黄间的“阪泉之战”，在《大戴礼记·五帝德》^④《左传》^⑤《列子》^⑥等中也都有记载。但先秦汉晋以来文献记载中两场战争就已有混淆，除上述《逸周书·尝麦》记载蚩尤逐炎帝也在涿鹿，《逸周书·史记解》^⑦、《水经注》^⑧也有类似记载，近世学者也多将二者混同，^⑨不过尚不足以否定《史记》的说法。

上述文献所记涿鹿之战中的轩辕黄帝、炎帝和蚩尤，显然都是具体的个人，也有不少记载中的黄帝、炎帝和蚩尤只是部族首领的统称。当然无论是个人还是部族，都应有

-
- ① 李学勤认为《尝麦》篇文字多与西周较早的金文类似，有可能是穆王初年的作品。（参见李学勤：《古文献丛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87—95页）
- ② 《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3页。
- ③ 《战国策·秦策一》：“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庄子·盗跖》：“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 ④ 《大戴礼记·五帝德》：“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此处炎帝作“赤帝”。（参见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第117—130页）
- ⑤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
- ⑥ 《列子·黄帝》：“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杨伯峻：《列子集释》卷2，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4页）
- ⑦ 《逸周书·史记解》：“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畔之，阪泉以亡。”（黄怀信、张懋镛、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第965—966页）
- ⑧ 《水经注·灋水》“涿水出涿鹿山……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而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水道源县之东泉”一段下，引《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中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83—1184页）
- ⑨ 参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页；王北辰：《黄帝史迹涿鹿、阪泉、釜山考》，《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个大致的活动范围,只是炎、黄等的传说遍及大江南北,自汉代以来就众说纷纭。^①《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徐旭生据此并结合其他材料考证认为,黄帝部族发祥于偏北的陇东陕北地区,炎帝部族则发祥于偏南的渭河上游地区,二者都属于华夏集团。此后他们向东迁徙,在路线上同样是前者偏北而后者偏南。^②徐旭生还认为蚩尤属于东夷集团,是九黎的首领,九黎的活动范围从晋东南一直延伸到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之处。^③但从《尚书》《国语》等相关记载看,蚩尤还是苗蛮集团的先祖,^④将之归入苗蛮集团也未尝不可,可见蚩尤部族活动范围很大。关于黄帝和蚩尤发生交集的“涿鹿”虽也有不同说法,但大致都在华北一带,尤其今冀西北涿鹿一带为涿鹿古战场的观点被更多人认可。^⑤黄帝部族从陕北东向经内蒙古中南部到达冀西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炎帝部族,按照徐旭生的说法,是偏南沿着渭河流域东向发展,应该是抵达晋、陕、豫交界地带才更合情理,与冀西北相距较远,炎黄之间的阪泉之战也就更有可能发生在晋南附近。

轩辕黄帝早于后稷、夏禹的时代。从大约距今 4100 年往前追溯,直到距今 4700 多年,就能看到在陇东陕北至华北这一大片地方,曾经发生过一次考古学文化格局的巨变。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在仰韶晚期向庙底沟二期转变的过程中,文化仍连续发展,而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豫中地区则不然:内蒙古中南部老虎山文化代替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冀西北地区老虎山文化替代雪山一期文化,冀南豫北和郑洛等地的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秦王寨类型衰亡,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消亡,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当中新增不少横篮纹。这种突变当和黄土高原文化的东进有关。与此同时,在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突然涌现出许多军事性质突出的石城。这些变化可能是由黄土高原人群在大规模战争事件中的胜利而导致,很可能对应文献记载中的涿鹿之战。^⑥尤其是在冀西北张家口贾家营遗址明确存在老虎山文化前期遗

-
- ① 司马迁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史记》卷 1《五帝本纪》,第 46 页)
- ②③ 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 40—48、48—54 页。
- ④ 《尚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这里的蚩尤和苗民实际上是同一对象,“皇帝”当即“黄帝”而非尧。又据《国语·楚语下》“三苗复九黎之德”一句,知苗民(三苗)和九黎关系密切。《国语·周语下》更有“黎苗之王”的提法。
- ⑤ 参见王北辰:《黄帝史迹涿鹿、阪泉、釜山考》,《北京大学学报》1994 年第 1 期;白国红、沈长云:《古涿鹿地望与黄帝相关问题新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5 年第 2 期。
- ⑥ 参见韩建业:《中国北方早期石城兴起的历史背景——涿鹿之战再探索》,《考古与文物》2022 年第 2 期。

存,①文化面貌和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同期遗存近似,上限有可能早到庙底沟二期。崇礼邓槽沟梁甚至还发现老虎山文化的城址。②冀西北被认为有可能是古涿鹿之地,张家口的这些发现为涿鹿之战的实证增加了新的线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冀西北等地在庙底沟二期之前是雪山一期文化,其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海岱地区是蚩尤或东夷部族的大本营,大汶口文化很可能是以蚩尤等为首的东夷部族的文化。③大汶口文化和江汉两湖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的形成有很多共性,屈家岭文化被认为是三苗或苗蛮的文化,④而记载中蚩尤又是苗民的领袖,⑤可见东夷和苗蛮关系非常密切。距今 5000 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晚期,中期大汶口文化和早期屈家岭文化分别强烈向西向北影响,很多文化因素渗透到郑洛、晋南、关中东部各地,⑥这或可视为蚩尤所代表的东夷和苗蛮集团大力扩张并侵袭黄河中游各部族的考古学证据。这种情况从庙底沟二期开始发生重要转变。距今 4700 多年恰好是中国考古学上一个重要时代——庙底沟二期的开启年代,不少人认为庙底沟二期已属于广义龙山时代的早期;⑦传承下来的黄帝纪元元年为公元前 2698 年,也正在这个年代范围之内。⑧

- ① 以贾家营 H3 为代表。(参见陶宗冶:《河北张家口市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6 期)
- ② 参见张文瑞、王刚:《河北省张家口市邓槽沟梁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2021)》,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 年,第 118—124 页。
- ③ 参见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 年第 9 期。
- ④ 参见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而作》,《文物》1980 年第 10 期。
- ⑤ 参见《尚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苗民弗用灵。”
- ⑥ 参见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 年第 4 期;许永杰:《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现象初探》,《考古学报》2010 年第 2 期;孟原召:《屈家岭文化的北渐》,《华夏考古》2011 年第 3 期。
- ⑦ 庙底沟二期多被认为属于龙山时代的早期。(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年)也有学者认为属于仰韶文化末期。(参见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 122—165 页)无论如何,这一阶段都是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
- ⑧ 辛亥革命后以黄帝纪元 4609 年即公元 1912 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则黄帝纪元元年当为公元前 2698 年。(参见金西来:《轩辕甲子·黄帝纪元考》,《学术月刊》1986 年第 7 期)范文澜也认为传说中黄帝和蚩尤等的战争发生在公元前 2700 年前后。(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 9 页)2019 年出版的《姬氏祖传经》前言中,传承人姬英明注明当年为“黄帝纪元四千七百一十六年”,则黄帝元年也是在公元前 2698 年。(参见姬英明辑:《姬氏祖传经·仁经(人经)》,北京:线装书局,2019 年)

(四)五帝时代的基本时空格局

从考古学上大致实证禹征三苗、稷放丹朱、涿鹿之战事件,建立了进一步探索五帝时代的三个基点,其基本时空格局也可由此初步推定。

禹征三苗事件的实证,进一步确定了夏禹的历史真实性和夏代的上限,证明以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后期属于早期夏文化,石家河文化及其前身屈家岭文化等属于三苗文化。禹征三苗之后,黄河、长江流域文化融为一体,奠定了夏王朝版图的基础,因此,《尚书·禹贡》的“九州”很可能记载的是距今4000年左右的真实状况,^①基本等同于夏初疆域,^②而非出于战国时人的想象。

稷放丹朱事件的考古学探索,说明尧、丹朱、后稷可能确为真实历史人物,由此可推知《尚书·尧典》等文献记载的舜等其他人物也应当基本属实,证明晋南的陶寺文化至少有一段时间和陶唐氏尧有关。

涿鹿之战事件的考古学探索,说明轩辕黄帝、蚩尤、末代炎帝,以及文献所载同时期人物,都可能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推测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后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可能属于黄帝部族文化,以东北平原直至黄河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后期、雪山一期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可能与蚩尤部族有关。这两大区域之间的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等地区,可能就是炎帝部族的核心分布区。

由此可见五帝时代人物的活动范围主要是黄河和长江流域,尤以黄河流域为主,时间上则从4700多年前延续至约4100年前。又可归纳为早、中、晚三期,其中轩辕黄帝、蚩尤和末代炎帝等最早,距今4700多年;帝喾、尧、舜、稷、丹朱、禹等属于晚期,距今4100年左右;颛顼在中期,年代介于二者之间。《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颛顼、帝喾分别为黄帝的孙和曾孙,之后紧接着就是尧、舜,似乎五帝时代不过五六代人,充其量也就100多年,现在看来应当存疑。如果承认颛顼为黄帝之孙,帝喾为后稷之父,则颛顼和帝喾之间就可能间隔了20多代、500多年。

早于距今4700多年的前五帝时代的文化,在考古学上也是有线索可循的。既然距今4700多年的黄土高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有可能为黄帝部族文化,那么黄土高原或者渭河流域更早的仰韶文化理应与更早的黄帝部族有关。仰韶文化初期开始于距今7000年左右,当时分布在关中和汉中地区的零口类型诞生不久,即东向扩展至晋南豫西地区,形成与零口类型大同小异的仰韶文化枣园类型。联系《国语·晋语》黄炎同源

① 参见李民:《〈禹贡〉与夏史》,《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1—30页。

② 参见朱渊清:《禹画九州论》,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5—70页。

而分道的记载,零口类型有可能是最早的黄炎共同的文化,此后的零口类型中晚期和半坡类型则可能是黄帝部族文化;而晋南豫西的枣园类型,以及后续的东庄类型、庙底沟类型,则主要为东迁后的炎帝部族文化。黄炎之外其他部族的文化也可以循此逻辑向前追溯。

以上对五帝时代时空框架的建构主要是根据几个关键点做出的,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将文化、基因、语言和族属谱系结合起来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相信会得到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

四、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初步发展

从现在的考古学研究来看,中华文明起源于距今 8000 多年,形成于距今 5100 年左右。因此五帝时代并非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时期,而是已经进入初步发展时期。^①

距今 5100 年左右中华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良渚和南佐两个超大型聚落遗址的发现。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内城面积近 300 万平方米,计入外城则达 630 万平方米,内城中部有 30 万平方米的人工堆筑的“台城”和宫殿建筑,^②有随葬 600 多件玉器的豪华大墓,^③出土了大量玉器、水稻等,外围更有高低坝、沟壕等构成的大规模水利系统。甘肃庆阳南佐遗址面积 600 万平方米左右,遗址核心区由两重环壕和九座大型夯土台围成,面积达 30 多万平方米;其中央偏北处围出数千平方米的“宫城”,主殿夯筑而成,占地 700 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精美白陶、黑陶和水稻。^④这两个规模超大的中心聚落,宫殿建筑、壕沟水利等工程浩大,玉器、白陶、黑陶等的制作都有很高的专业化水准,说明已出现强大的公共权力或王权。两个聚落都在继承原有聚落(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了跃进式发展,超常的规模依赖于对较大范围内人力物力的统一调配,这无疑指向地缘关系对早先区域性氏族社会格局的重塑。笔者认为,王权和地缘关系的

① 许顺湛、陈唯声等提出将黄帝时代甚或五帝时代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参见许顺湛:《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州学刊》1992 年第 1 期;陈唯声:《中国文明的起源应上溯至五帝时代——中西文明之比较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北方论丛》1996 年第 4 期)

② 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 年。

③ 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

④ 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3 年第 7 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庆阳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 F2 发掘简报》,《文物》2024 年第 1 期。

同时出现,显示两地业已迈入早期国家行列,中华文明正式形成。^①但两处早期国家的统治范围基本不出太湖周边或黄土高原地区,称之为“古国”或“邦国”比较合适,^②属于“古国文明”阶段。

距今 4700 多年是中华文明初步发展的关键节点。黄土高原文化的东向强烈拓展,很可能已将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河南中部等地区纳入一个更大的国家组织之内,甚至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区可能也属于这个早期国家的统治范围。而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通过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轩辕黄帝已经统一天下,置官设监,监于万国。不但统治黄河流域,还“南至于江”。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大致可以吻合。距今约 4500 年以后,面积达三四百万平方米的襄汾陶寺都邑和神木石峁石城先后在晋南和陕北地区出现,黄土高原的文化中心地位得以延续。

距今约 4100 年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关键节点。此时至少长江中游地区已经通过“禹伐三苗”事件被纳入华夏集团版图。《尚书·禹贡》等记载的夏禹划分“九州”,很可能即真实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据此可以说,至迟在夏朝初年夏王已经初步建立起“大一统”的天下王权。^③其统治特色是由夏后氏及许多其他族氏共同构成统治集团,从而建立起“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政治组织”,^④而所谓“九州”即统治天下“万国”的结果。这些标志着“王国文明”阶段的到来。

结 语

通过对文献传说和考古学的对证研究,我们现在可以说,文献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应该是真实存在过的,其年代大抵从约 4700 年前延续至约 4100 年前。前后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大体自轩辕黄帝、蚩尤和末代炎帝等起,继以颛顼和其后诸帝,最后为帝喾、尧、舜、稷、丹朱、禹等。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过起源和形成的时期,进入初步发展阶段。经过长期兼并融合,跨区域的王权国家在此时萌芽,早期时已至少形成对黄河流域大部的统治,晚期时更以“禹征三苗”为契机,将长江流域也纳入国家版图,夏王朝初步“一统”的格局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
- ① 恩格斯提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又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87、193 页)
- ② 参见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236—251 页;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 年第 1 期;王震中:《邦国、王国与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河南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
- ③ 王震中所说夏商周时期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实质就是“一统”政治中国的早期阶段。(参见王震中:《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文史哲》2010 年第 1 期)
- ④ 参见沈长云:《夏朝的建立与其早期国家形态》,《齐鲁学刊》2022 年第 1 期。

五帝时代是古代中国人心中信史的头一篇章。以五帝为代表的上古祖宗先圣，其后更成为历代敬仰效法的对象，奠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追求文化“一体”、政治“一统”的基础，也成为延续中华文明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百年来对五帝时代的质疑和否定，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中华历史根脉的质疑和否定。虽然考古学为复原、重建中华上古史带来了新的途径和方法，^①但考古学的局限性又决定了它并不能独立解决上古时代的精神创造、制度创造、族群认同、历史记忆等重大问题，而精神创造和制度创造才是中华文明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明、之所以伟大长存的核心所在，族群认同和历史记忆更是中华民族凝聚发展的关键。因此在缺乏深入论证的情况下，不应轻易否定五帝时代，更不该轻率地把结合古史传说的研究看作考古学发展的障碍和误区。

当然，从考古学出发探索五帝时代古史并不容易，它要求研究者必须熟谙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学知识系统，必须掌握严谨可靠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盲目比附。它更要求研究者必须认真辨析后世文献对五帝时代真假杂糅的记载；根据新的发现不断完善仍比较粗糙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大力加强基因和语言谱系的建设工作；以及完善创新进行古史和考古学对证的理论方法。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机会逐渐接近五帝时代的真相。

〔责任编辑：晁天义〕

^① 参见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33 本，1962 年；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中国通史〉第二卷序言》，《史学史研究》1991 年第 3 期。

This paper critically examines contemporary forms of hylomorphism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offering an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theoretical motivations, and core aspects of this revival, clarifying their relation to classical hylomorphism as well as their current significance and limitations.

Capitalism and the Grand Narrative of Early Modern World History

Yu Jinyao · 160 ·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s a fundamental reality in the trajectory of early modern world history, leaving a profound and far-reaching impact. As both a central concept in historical studies and an analytical tool, capitalism enables historians to better analyze and critique historical processes. Marxist theories on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wage labor, capital accumulation,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the world market—offer vital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of the past five centuries. Historiography necessitates grand narratives, and the growth of capitalism serves as a critical thread for interpreting early modern world history. Marxist theory on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provides a fitting framework for constructing such a grand narrative of early modern world history.

On the Era of the Five Emperors

Han Jianye · 180 ·

The “Era of the Five Emperors” refers to the protohistoric period of ancient China preceding the Xia dynasty, as recorded in ancient historical legend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surrounding key events such as “Yu’s conquest of the San-miao,” the “Deportation of Danzhu by Hou-ji,” and the “Battle of Zhuolu” suggests that this era has a basis in historical reality. Spanning from approximately 4,700 to 4,100 years ago,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beginning with Xuanyuan Huangdi, Chiyou, and the last Yandi; continuing through the period of Zhuanxu; and culminating with emperors Ku, Yao, Shun, Ji, Danzhu, and Yu.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dicate that during this era, Chinese Civilization had moved beyond its origins and formative stages, entering a phase of early development. By this time, a nascent cross-regional monarchy likely emerged, with its influence encompassing much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ubsequently, with the event of “Yu’s conquest of the San-miao” as a turning point,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was also incorporated into the realm. It was upon this foundation that the early “great unity” structure of the Xia dynasty was established.